

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使知识结构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三论”的方法使知识的重建和整合成为可能。正是在此背景下,众多新型科学相继产生,从三十年代到今天为止,传播学已成为众多学科中最有魅力的学科之一,由于该学科的综合性质对它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历史学等众多的领域,而现代新型学科的方法特别是系统论的方法,又给传播学提供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传播学结构上的整体性预示了它是诸多系统的统一。在这个系统中,意义能否实现,在传播学中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对意义的分析将涉及到意义的载体——符号问题,本文拟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考虑符号的社会根源和性质,从而展示它为传播学所提供的前提和结构框架。

符号问题是近代诸多学科集中关心的问题。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建立“符号学”以来,米德及布罗默将符号运用到社会学中,并创立了社会学符号;卡西尔及苏珊·朗格将符号运用到美学中,创立了“符号学美学”;列维-斯特劳斯将符号学运用到文化人类学中,从而建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尤其是符号学与结构学的结合趋势,使符号的意义显示了巨大的潜能,正因为如此,考察符号的社会性质对传播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传播学作为新型的学科,从它产生起就显示了与社会学的密切联系,无论是传播模式的型态还是传播学理论的框架,都依赖社会学的完善和发展,而社会学的核心集中在人与人组成的社会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的问题上,即符号问题上。这样,社会学就给传播学提供了文化上的前提。

对任何符号的界定都离不开符号的社会性成因,符号生成的历史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对此问题完整的解答不仅依靠语言文字正式的记载,还要追溯到语言文字产生前原始思维方法下的文化特征。十分显然,人类自语言产生后的文明要比原始思维状态下的历史短得多。从性质上看,各民族文化的的高度发展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尽管它们的表现形态各不相同,但它根本区别于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无疑是人类文化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尤其是伴随着自然科学认识自然规律卓有成效后才相对独立发展起来,原始思维及其产物——原始文化的基质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它不服从逻辑的法则而是以情感为动力,神话就是它们生命——自然一体化的产物。与此相关,神的确立意味着宗教有了确切的内容,神话和宗教是原始思维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活动,在此问题上,泰勒和弗雷泽分别从人类文化学作过深刻的论述。在语言发展以前,神话和宗教的符号性质直接贯穿在原始人生命——自然一体化中,而语言的产生,则标志着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语言的产生即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永久界限,又是文明真正诞生的里程碑。因为语言标志着人类对外在世界抽象的开始,原始的感情为清晰的逻辑结构所代替,重要的是观念已成为衡量外界及自身的尺度。毫无疑问,语言使主客体不分的原始状态第一次划清了界限。语言的语音记号是沟通主客体的桥梁,语言一方面代表了所形成的观念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代表了主体的心灵状态,没有这种中介性质概念和思想的形成都无法想象,语言意味包含了对象及主体的综合。这样,语言的中介性质也体现在它的符号特征上,“在这个新的语言符号中,印象的世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恒定性’,因为它获得

了新的理智构架。通过以语词对一定内容进行的区分和固定,不仅透过内容标示了确定的理智性质而且实际上赋予这些内容一种性质,由于这些性质,内容已经超出了所谓感觉性质的纯粹直接性,这样一来,语言就成为人类精神的基本工具之一,通过它,我们从纯粹感觉的世界前进到直觉和观念的世界。它包含着后来在各种科学概念的形成过程中以及它们的形式逻辑统一性显示出来的理智作用的萌芽”。①符号的意义集中体现在它的抽象和概括上,即通过符号,我们能够理解外在的世界和我们的意识本身,语言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符号,所以,对符号的界定就预示了它与意义的联系,符号不仅仅是一种物的形态,它与意识的联系也就规定了它的价值,“在心灵的内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符号真正构成了认识事物客观本质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通过与内容相关联的记号,内容自身获得了新的永存。这是因为相对于具体意识内容的实际流动来说,记号具有一种确定的观念的意义,这种意义本身是持久。……它作为一个整体的代表,作为潜在内容的集合体而常存。此外,它代表着最根本的‘共相’”。②总之,思想的表达和接受都是通过语言符号来完成的,不仅语言如此,人文科学中的其他的领域,象艺术、历史、科学无不是将心灵的特定的领域符号化,因此,符号就不仅仅是一种结构问题,也是结构建构活动中的功能问题,在这里,功能的意义体现在它创造和构形的力量上,这个过程显示出心灵的巨大能量,它使原本的存在获得了确定的意义,各门科学如语言、艺术、历史都能追溯到各自的根源。“每一种功能都创造出自己的符号,这些符号形式即使不与理智符号相似,至少也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而与理智符号享有同等地位。这些符号形式中没有一种能简单地还原为其它形式,或由其经形式衍伸出来,每一种形式都选定一特殊的角度,在其中并通过它构成自己的‘实在’方面。它们不是一独立的实在在其中向人类精神显现自身的种种不同方式,而是人类精神迈向其客观化,即自我显现的诸条道路。”③认识的历史确凿无疑地证明文化不断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体现在人认识对象世界深刻和自身的丰富上,而这个过程则体现在符号的创造上,符号的意义则意味着人类解释对象世界及自身,它们的共同的根源都出人类探索自然及心灵奥秘的企图上。这样,功能的意义就联系到人最深刻的本质上,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功能作用的真正功力,“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示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的分界线。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造他自己的宇宙——一个使人类经验能够被他所理解、联结和组织、综合化和普通化的符号的宇宙。”④一旦界定出人的特征就在于符号的创造上,那么,对人的理解就为广泛和文化科学的理解提供了一条可靠的途径,符号最终的意义植根于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天性之中,符号系统建构了可以理解的世界,人通过符号才能体会到人所具有意义和使命。

本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和布罗默在社会学中进一步发展了符号理论并创立了符号互动主义,其理论认为社会是人与人互动结果,人与人的群体构成人类思想、意识及行为的根本,社会交往中的媒介就是符号,创造符号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在符号系统中,人类表达自身并通过符号为他人所接受,社会结构就建立在符号为中介的互动关系中,毫无疑问,社会符号学为传播学提供了社会学的方法论,正如黑格示所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方法和内容的区别,只在于概念的各环节,即使就它们本身,就它们的规定性来说,也表现为概念的全体。”⑤这意味着社会学的基本规定与传播学的内容不是相对立,而是社会学在不断将自己特殊化,在结果中仍清晰地保持自身的共性。反之,传播学作为更具体的学科,它也将社会的普遍性包含自身。不言而喻,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社会学,但传播学本身体现的符号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无论什么样传播模式,无论什么样的传播理论构架,从结构上来区分都可分为传播者、受众及信息,其中,前两者又可以抽象为具有意识的主体,后者则为固定意义的载体——符号(包括非语言符号),这样

一来,传播学的理论则可以概括为共同文化根基下的人通过符号交流的理论,所以,传播学的理论构架就有人文科学的一般的规定性,即传播学的结构受该结构的“前结构”的制约,从更大的范围来看,社会学构成了系统的“能指”,而传播学构成了“所指”,前者具有内容及意义的层次,后者则构成了形式及表达的层面,传播学得以实现的基础是在传播前共同文化背景——语言、心理、社会、逻辑等因素使传播者和观众达成“共时”,即潜伏在人类心灵底层的功能力量,这种功能力量普遍地植根于各民族的文化模式中,尽管不同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经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共同的社会心理集中体现在符号的创造上,它不是操作意义上的符号,而是各种功能把握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成为可以理解的不同方式。不难想象,如果人类在社会中根本就没有心理上共同的默契,那么,任何科学的成立都不可能的,正因为符号活动植根于人类的天性,符号再现也就对心灵的公认和复现,只有在此意义上,才有意义的产生,也只有在此意义上,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才能获得更为深远的意义。最后,在此意义上才能找到传播学得以产生、发展的理论根据。(作者单位:山东省广播电视厅《山东视听》编辑部)

注释:

- ①②③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 221 页,222—223 页,209 页
- ④卡西尔《人论》,第 279—280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 ⑤黑格尔《小逻辑》,第 427 页,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7 月第 2 版。